

黎正甫與《羅馬教皇世系》

林雪碧

[摘要] 黎正甫（1908-88），福建人，戰後定居香港。一生中大部份時間都在天主教會機構中工作，例如曾任天主教聯合會《公教學校》編輯，又曾任教於嘉應教區備修院、小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等各級修院逾20年，對教會培育神職及文宣工作貢獻良多。著書十餘種，涉獵範圍廣泛，遍及文學、歷史、宗教等。遺著中有《羅馬教皇世系》，記述歷來約260任教宗的生平事蹟，當中帶出了天主教會的歷史沿革，與教宗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此書至今未有出版，本文即透過現存的兩份手稿，分析此書之內容特色。由於學者一直未有對黎氏生平作過任何研究，本文亦會一併介紹。

機緣之下，本人得見黎正甫著《羅馬教皇世系》的兩份遺稿，始聞黎氏之名。其後協助台灣陳梅福神父搜尋黎氏資料，發現黎氏著作甚豐，研究興趣廣泛，但有關黎氏本人的資料卻甚少，至今未有學者對其學術思想加以系統性的研究。

《羅馬教皇世系》是天主教歷任教宗的合傳，為第一本以此為題材的中文書籍，可惜無緣出版面世。而黎正甫在天主教各級修院教學二十餘年，又在天主教出版機構任職多時，對國籍神職之培育與教會文宣工作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分為兩部分，分別介紹黎氏生平行誼及《羅馬教皇世系》一書，以期黎氏及其著作不至就此被人遺忘。

一·黎正甫生平¹

黎正甫（1908-1988），福建省上杭縣人。天主教於清末傳入上杭，黎家上下亦奉教，因此黎氏出生後不久即領受了天主教洗禮，教名安多尼。

黎正甫聰敏好學，自幼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奠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及後轉入廣東蕉嶺中學，該校歷史悠久，初名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以作為培養閩粵地區小學教師人才的新式學堂，至今仍為廣東省一級學校。²黎氏從新學堂中得以接觸西學，亦為其與廣東結緣之始。黎家以其為可造之才，於是籌措旅費，遠送他到北京求學，黎氏亦不負各人所望，於1922年考入北京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學校學生享有公費，畢業後多獲分發到北京各小學任教，頗受重視，故每年投考人數往往超額數十倍；校方對學生要求嚴格，校風純良，學生在生活與學習上均極為刻苦，知名校友眾多。³黎氏在該校三年接受了嚴格的訓練。⁴在北京讀書多年，黎氏可能得過廣東嘉應教區的資助，故而日後先後任教於該教區之預備修院及小修院，以作報答。⁵

¹ 資料主要根據陳梅福編，《黎正甫教授紀念集》（〔台灣苗栗〕：陳梅福，2004）。

² 蕉嶺縣文體旅遊局，〈蕉嶺縣文體旅遊局：桂嶺書院〉，2015年9月28日，
<http://www.jlwtlyj.com/showart.asp?art_id=2745>[2016-09-17]。

³ 如文學家老舍、音樂家王洛賓等。北京教育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京教縱橫：北京最早的師範學校〉，無日期，<<http://jyzh.bjedu.cn/yq/2012-05-22/9392.html>>[2016-09-15]。

⁴ 據黎正甫學生尹雅白神父記述，黎氏曾就讀於北京輔仁大學，見尹雅白，〈追悼黎正甫教授〉，《公教報》，1988年2月12日，頁14；但按黎氏之生平行誼，並無此事，實應為曾在輔仁大學任職。

⁵ 陳梅福，《黎正甫教授紀念集》，頁5。

黎正甫出身於師範學校，終其一生亦可說從未離開教育行列。他於1925年畢業後，曾在小學任教約兩、三年。抗日戰爭期間，南下避難，先後受聘於浙江大學、中山大學等教授文史科，得以結識同校任職之諸位名士，如方豪、錢穆、羅香林等，始有日後黎氏引薦錢、羅二教授於香港華南總修院講演之機緣。⁶戰亂之故，浙江大學不時遷徙，黎氏亦隨校而行，曾停駐於江西、廣西、貴州等地。此番流徙，員生雖然受盡顛沛漂泊之苦，但亦有助於增廣見聞；黔桂毗鄰越南泰緬等國，這些國家均為昔日中國的藩屬，國民中留有華裔，日常生活中亦每有中國傳統之遺痕。黎氏或出於教學所需，或出於對國破城摧之感傷，於是就地利之便搜集資料，著手研究邊疆史，藉研究古藩屬之設置與興衰，緬懷古代中國之國力昌盛及先民經營之辛勞，先後著有《中暹關係史》、《郡縣時代的安南》。⁷

在官辦學校教學以外，黎正甫花了更多時間在教會修院內工作。他曾分別於嘉應教區松口預備修院及聖若瑟小修院任教國文；又兩度受聘為華南總修院中國文學教授，直至退休，這成為他為時最長的一份工作，而香港亦成為他的最後落腳地。1940年，黎氏首次應聘往華南總修院，後因香港淪陷，物資短缺，總修院亦難於維持，黎氏遂辭去教席返回內地。此次任期雖只一年多，但他藉總修院圖書館之便，借閱館內藏書，於此完成了《羅馬教皇世系》一書，又適逢總修院慶祝成立十週年，黎氏受託為總修院院歌填上歌詞，為陷於戰亂陰霾的總修院，增添

⁶ 同上，頁8。

⁷ 黎正甫，《中暹關係史》（貴陽：文通書行，1944）、《郡縣時代的安南》（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

點點歡樂氣氛，可惜的是歌詞早已散失。⁸ 1946年，黎氏再度赴港任教於斯。黎氏對修生期望甚殷，他認為培育神職人員，主旨在使他們養成基督服役的精神，⁹ 又認為國籍司鐸，應是富有中華文化素養，德學兼備的福音傳播者，因此編輯《文選》一冊作為教材，內收中國古今作品42篇，除純文學的詩歌小說外，亦有議論文章，對研究文學具有指導作用。¹⁰ 他又要求修生在畢業前以「我將來傳教牧靈工作之方針」為題寫作。¹¹

教學以外，黎正甫亦多從事文字福傳的工作。在北京期間黎氏除於小學任教數年外，其餘時間都在天主教會機構內工作，主要任職雜誌編輯；其中，他在天主教教育聯合會工作最久。1928年，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成立公教教育聯合會，以有效推動中國天主教學校教育。黎氏則負責主編聯合會出版之《公教學校》，此為十日一期之旬刊，為全國公教學校之機關報，以檢討教育理論，刊佈國家教育法令，及報導國內外教育消息為主旨。¹² 黎氏以師範學校畢業生之身份擔任這工作，可說是學以致用；自此，黎氏開始研究教育理論與歷史，多次發表相關文章及著作如《兒童教育概論》及《天主教教育史》等。¹³ 黎氏1968年自華南總修院退休後，仍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及《公教報》服務，其獻身於教會的文教事業，終身不懈。

⁸ 施惠淳著；林瑞琪譯，〈香港華南總修院參考書目錄素描（1931-1946）〉，尹雅白編，《鐸跡天涯：華南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香港：華南聖神修院，1981），頁19。

⁹ 黎正甫，〈修院創辦的宗旨與聖召的培育〉，尹雅白編，《鐸跡天涯：華南聖神修院金禧紀念特刊》，頁25。

¹⁰ 黎正甫，〈編輯大意〉，《文選》（香港：華南總修院，1950），頁1。

¹¹ 陳梅福，《黎正甫教授紀念集》，頁8。

¹² 黎正甫，《天主教教育史》（台中：光啟出版社，1960），頁368。

¹³ 黎正甫，《兒童教育概論》（北平：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1936）。

1988年1月，黎正甫因病辭世，享年80歲。殯葬禮在香港聖瑪加利大堂舉行，遺體安葬於柴灣天主教墳場。台灣嘉義教區亦為之舉行追思彌撒，由主教林天助主祭，14位曾受業門下之神父共祭。

黎正甫畢生理首於教學，從事學術研究，涉及文學、歷史、教育及宗教等多個範疇，著作數量亦多，除上文提及的著作外，尚有《雨後殘蕾》、《庇護十二世的生活》、《宗教與人生》、《真福嘉諾撒小傳》及《學苑英華》等。¹⁴

黎正甫在天主教修院內任教的不是神哲學等主要科目，可能因此其課堂不太受重視，¹⁵ 但是，他在三級修院內任教長達二十多年，在平信徒中事屬罕見，其對國籍神職人員的培育，不能不記一功。而黎氏在退休二十年後逝世，即使遠在台灣仍有受業門生為其舉行追思彌撒，其中情義亦不應忽視。其學生所追懷者，除了黎氏的學問，及其終生服務教會之情誼，相信亦感念其為人自奉淡泊，具有儒者的風範。據悉，黎氏常常穿著一襲中式舊衣而怡然自得，有人送他新衣或金錢，他亦堅拒不受。其情操直可與顏回相比：「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¹⁶

¹⁴ 《雨後殘蕾》（北京：傳信書局，1928），《宗教與人生》（北京：傳信書局，1930），《真福嘉諾撒小傳》（香港：嘉諾撒仁愛會，1941），《庇護十二世的生活》（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49），《學苑英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83）。

¹⁵ 陳梅福，《黎正甫教授紀念集》，頁8。

¹⁶ 尹雅白，〈追悼黎正甫教授〉，《公教報》，1988年2月12日，頁14。

二·《羅馬教皇世系》

1. 釋名及結構

「Pope」一辭，今日多翻譯為「教宗」，但黎正甫認為雖有教會之宗主的意思，但倒過來則為「宗教」，尤其在橫向書寫時，容易左右反向誤讀，產生混亂。因而使用另一辭「教皇」為書名，黎氏解釋教皇並不是指其人是教會中的皇帝，或身兼教長及帝王之權；而是指其為教會中之偉大領袖，並且這用語為當時之常用翻譯。

而「世系」是指教宗作為教會領袖而世世相承，連綿不絕。教宗之位雖非經由父子世襲，亦不是師徒傳授；但是有份參與教宗選舉之樞機，均為前任教宗所擢升；而且教宗稱號中之第二世或第三世，亦足以顯示兩任教宗即使相隔百年，但因為敬重前任之道德操守，或仰慕其功業，而取相同名號，亦有繼承之意。尤其重要者，歷來二百餘位教宗均為承繼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羅馬主教之位，有共同的信仰，為同一教會服務，故題名為《羅馬教皇世系》。

除序言之外，全書共分四部份：

- i. 導言：羅馬教皇之地位與職權
- ii. 羅馬教皇世次
- iii. 偽教皇列傳
- iv. 譯名索引

2. 源起及版本

本書從未出版，目前所見的兩份手稿，第一本在序言中註明日期為1946年8月15日；第二本則未有標明日期，最後記事至1962年。

據第一本〈自序〉所述，黎正甫本擬編寫一部天主教會史，但有感歷代教宗之活動實為教會之重心，因而決定先撰寫教宗史。適值其受聘於華南總修院，得以參閱總修院圖書館藏書，藉以豐富書中材料，初稿成於1941年，後因戰亂而散佚。其間，黎氏發表了〈羅馬教皇的優越地位與職權〉一文，論述教宗作為基督在世之代表及羅馬主教的優越性，及其權力的性質與範圍。¹⁷ 1946年，黎氏重赴香港才尋回書稿的一份副本，於是把此文加入書中作為導言，並增加〈偽教皇列傳〉。黎氏先發表了〈自序〉，¹⁸ 又請得遠東首位樞機主教田耕莘及南京教區主教于斌為此書題字。¹⁹

至於第二本，除了遣辭造句稍與前本不同外，尚增加了一篇由華南總修院前院長馬良（John O' Meara, S. J., 1898-1991）撰寫之序言，而最重要的是按1961年宗座年鑒（*Annuario Pontificio*, 1961）修正了歷任教宗名錄。²⁰ 例如刪去752年當選但從未就職的斯德望（Stephen）；加入964年曾登位之良八世（Leo VIII），加入具爭議的西爾物斯德肋（或譯思偉

¹⁷ 黎正甫，〈羅馬教皇的優越地位與職權〉，《世光雜誌》，第3卷第1期（1943年），頁3-9。此文於第一本題為〈論教皇之地位與職權〉，於第二本則題為〈羅馬教皇之地位與職權〉。

¹⁸ 黎正甫，〈羅馬教皇世系自敘〉，《益世主日報》，第27卷第11期（1946年），頁5-6。

¹⁹ 黎正甫，〈自序〉，《羅馬教皇世系》（未刊印版本，1946年），頁6。手稿中未見田、于二人之題字。

²⁰ 黎正甫，〈自序〉，《羅馬教皇世系》（未刊印版本，1962年），頁4。

德, Sylvester III, 1045)。如此一來,書中的教宗名錄與梵蒂岡教廷所承認之正統者趨於一致;不過這些改動均只見於書中目錄,按筆跡估計屬於後期修改,正文則未見隨之增刪。此外,又增補了庇護十二世及若望廿三世之事蹟,記事至1962年3月19日止。²¹而偽教皇部份則增加了烏西濟諾(Ursicinus, 366-67)、歐拉略(Eulalius, 418-19)、狄阿利(Theodoric, 1100-02)及亞肋利克(Aleric, 1102)等四人。

〈譯名索引〉為單行本,以英文打字及中文手寫而成,共四十頁,沒有註明日期,但按其標示之頁碼及譯名應為第二本之索引,如Damasus、Fornovo在第二本及索引均譯作「達瑪蘇」、「伏諾福」,頁碼均為40及298,第一本則分別譯為「丹旭」及「伏爾諾福」。²²至於第一本有否兼備索引,則不得而知。

從第一本到第二本,此書之出版似乎已經準備就緒,然而始終未有成事。當中確實原因已無從得知,但從第一本〈自序〉中一句被刪去的話或可窺知一二:「……又以字數較多,出版困難,力求文字之簡省,擬改作文言而未果。」²³事實上,以全書四百餘頁,對於四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之中文出版而言,均屬長篇大作。而第二本雖已謄正,但處處均有修改文句之痕跡,更有把「現任教皇」由若望廿三世改為保祿六世。²⁴按其記事至1962年3月19日止,距若望廿三世逝世不足三個月,黎氏極有可能打算增補此三月甚或保祿六世之資料。或許正因黎正甫求好心切,希望書中內容更趨完善,以致遲遲未有出版。

²¹ 同上,頁430。此外,早於1949年,黎正甫已發表單行本《庇護十二世的生活》,詳細記述教宗庇護十二世的生平事蹟、在二次大戰中的立場、曾發表之通諭等等。

²² 黎正甫,〈自序〉,《羅馬教皇世系》(未刊印版本,1946年),頁49,348。

²³ 同上,頁6。

²⁴ 黎正甫,〈自序〉,《羅馬教皇世系》(未刊印版本,1962年),頁4。

3. 內容

故名思義，本書內容為記述歷任教宗之生平。教宗一人，關繫著整個天主教會，因此其活動、取捨，並非純屬其個人之事，而是牽涉到教會之興衰與日後之發展路向，本書以記述歷任教宗的事蹟為主軸，從而反映歷史事件，突出了教宗在教會史之重要地位。例如，教宗維道一世（St. Victor I, 189-99）在耶穌復活節日之爭上，勒令各地教會遵循羅馬教會的傳統在星期日舉行慶典，為長久以來相關的爭論定調；²⁵ 此外教宗竇達圖一世（St. Adeodatus I, 615-18），率先使用鉛印（*bull*）蓋於文件上，因此，日後教宗之重要敕令便稱為「*Bulla*」。²⁶

教會與各國社會，尤其古代歐洲文化、歷史之演變有著深厚之淵源，所以書中亦不乏教宗與歐洲諸國王公的互動事蹟。例如法皇丕平（Pepin III, 714-68）在教宗載珂理（St. Zacharias, 741-52）的支持下登基，其後丕平以羅馬附近的土地贈與教宗斯德望二世（Stephanus II, 752-57），開創了教皇國，使教宗成為羅馬的真正主人，奠定了教宗在俗世中的權利。²⁷ 後來教宗良三世（St. Leo III, 795-816）把羅馬城的旗幟交予丕平的兒子查理曼（Carolus Magnus, 742-814），視之為宗座的保護者並為他加冕，神聖羅馬帝國由是建立。²⁸ 所以，此書雖然不是一本教會史或歐洲史，但亦有助於瞭解教會之人事更迭、典章制度之沿革，以及歐洲社會之歷史進程。

²⁵ 同上，頁 18。

²⁶ 同上，頁 88。

²⁷ 同上，頁 113-115。

²⁸ 同上，頁 122。

由於本書是歷任教宗傳記的合編，所以它有著一般紀傳體通史的缺點；那就是同一事件，可能延續多年才有較為明確的進展，於是便得「斬件式」的出現在幾任教宗的傳記內。例如上述提到教宗俗權的確立，便牽涉六任教宗；而教宗國在1870年意大利統一時告終，為此教宗與意大利政府的角力，亦經歷五任教宗，至1929年才告一段落，所以讀者並不容易瞭解單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作為教宗，其首要身份當然是教會首領，因此在評論其一生功過時，往往不是以其人在政治外交上的得失為準則，而是在乎其行事為人是否合乎基督徒的信仰標準，是否堪當為基督徒的精神領袖。例如教宗吉樂休二世（Gelasius II, 1118-19）在與德皇亨利五世（Henry V, 1086?-1125）的爭鬥中一直處於劣勢，在政治上無疑是一位失敗者，但因其堅毅不屈，黎正甫給這位教宗很高的評價：「其時時準備為教會之自由奮鬥而犧牲，在位十二月，實無異於長期之殉道……」²⁹ 而教宗庇護九世（Pius IX, 1846-78）雖然喪失了教宗國的領土，但因著他個人的德行及他對教會的改革，黎氏在書中也沒有貶抑他；更在教宗逝世一百週年時，把有關他生平的篇章在《公教報》上發表，題名為〈教宗庇護九世可歌可泣的史蹟〉。³⁰

教宗亦凡人，歷任眾人之中，固然有很多志潔高尚、功勳卓越的；然而，喪德敗行之徒亦為數不少，黎正甫並未有因為自己愛護教會的立場而加以迴避，如教宗斯德望六世（Stephen VI, 896-97）因對前任教宗心懷恨怨，竟上演一幕拷問死人與鞭屍的鬧劇，書中直斥之為「教史上

²⁹ 黎正甫，〈自序〉，《羅馬教皇世系》（未刊印版本，1967年），頁213。

³⁰ 黎正甫，〈教宗庇護九世可歌可泣的史蹟〉，《公教報》，1978年5月12日，頁5及5月26日，頁5。

最可恥之事。」³¹ 此外，其對若望十二（John XII, 955-64）、本篤九世（Benedict IX, 1032-48）等人之醜行亦毫不掩飾。總能做到秉筆直書、不掩過、不揚惡之史家職責。

或由於資料難得、或由於篇幅所限，本書部份記述過於簡單，尤其早期教宗史料，多為引用前人著述；又如記述本篤九世時稱其施行「掠奪暗殺及其他壓迫人民之政策」，但具體情況卻未有詳述。³² 但對於近世教宗，書中則有較詳細的研究，所佔篇幅亦多。

4. 結論

在此書寫成以前，外文出版中已有若干內容相似的著作，³³ 黎正甫亦參考並引用過這些作品；若論本書之規模與研究成果，似未能超越前人。但以中文著作而言，當時並沒有有關教宗的專史，一直到1983年才有鄒保祿著的《歷代教宗簡史》面世，³⁴ 而兩書相較，黎著又顯得較為優勝。因此本書容或有不足之處，但仍有其相當之價值。

一書之寫成，著者須要耗費不少心力，尤其本書初撰於戰亂，其寫作過程之艱辛，當可想見；黎正甫對書中內容、用辭屢有修改，他對本書之重視，亦可見一斑。昔日資料難得，固然缺乏相關著作，即使以今天網絡發達資料搜集較易而言，以中文撰寫之教會史著多為中國教會專

³¹ 黎正甫，〈自序〉，《羅馬教皇世系》（未刊印版本，196?年），頁 146。

³² 同上，頁 179。

³³ 如 Attwater, Donlax, *The Dictionary of Pope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9) ; Von Ranke, Leopold,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13)。

³⁴ 鄒保祿，《歷代教宗簡史》（台南：聞道，1983）。

史，有關世界教會史者如鳳毛麟角，有關教宗之專史則更少，此書之無緣出版問世，殊為可惜。

[ABSTRACT] Li Zheng Fu (1908-99) dedicated almost his whole lif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e.g., he joined Church magazines as an editor and also taught over 20 years at minor and major seminaries of several dioceses. He was a scholar with deep knowledge i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religion. Among his numerous publications is *The Lives of Popes*. *The Lives of Popes* provides a record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life of each Pope, marks the changes of the Church and also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states. However, the book has not been published. By studying the author's two manuscript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t.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life of the author, as he has never been studied in detail.